

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

陈文联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它萌蘖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获得了真正觉醒。其显著标志是自立自尊的人格观念、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和救亡强国的社会意识在第一批先进女性中自觉确立。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当代女性运动的发展也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2-0237-06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是女性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女性主体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在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我国女性成为传统“四大绳索”束缚的精神囚徒,传统意识贬损的对象,她们没有自主人格、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默默地接受封建的“三从四德”之教化,把自己视为物化的家庭附属品,被动地维系着自己的人生需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先进中国女性主体意识也开始萌芽和觉醒。她们已意识到自己不是物化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明确客观世界即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可变化的,并尝试投入社会,自觉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并在不断的追求中获得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个性。至此,女性主体意识已获得了真正的觉醒。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蘖与觉醒,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蹒跚脚步的特征。

一、戊戌维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蘖

女性和男性同样是具有创造价值的人类,是社会的主体。然而自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女性的光辉也就随着父权的兴起而黯然失色了。女性作为主体的身份被剥夺,被异化为人类的统治的对象,沦为男性的奴隶。男性创造了男性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习俗,女性则默认和适应了这种男性文化的要求,甚至用一种女性的自律的方式维护着男性社会的秩序,并力图按照男性社会的文化规范与价值目标把自己塑造成完全符合男性标准的所谓“女性”,完全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直到戊戌维新时期,这一情形才有所改变,一部分先进女性的主体意识才开始萌芽。

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救亡图存中强国强种的作用。他们以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大力倡导妇女解放,并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积极开展谋求妇女形

收稿日期:2005-01-1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2003ZC50);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基金(湘教通2003-165)

作者简介:陈文联(1967-),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性别思想史。

体解放与精神解放的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维新志士所开展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大大开化了社会风气,极大地促进了少数先进女性的觉醒。以康同薇、裘毓芳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冲破世俗的偏见和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在维新志士的倡导与支持下,于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女学会”;办起了中国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公开提出了“天地生人,阴阳平等”、妇女参政、婚姻自主等主张,开始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她们逐渐意识到女性对社会的责任,号召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鲜明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响亮口号,并将自己的活动融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洪流之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尽管她们人数不多,其思想和行动上还不是完全自觉的,或者说是被夫父推向历史前台的,但其作用不可小视。它表明沉睡两千多年的妇女,已经开始走出闺房,迈向社会,开始投身于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充分显示出一种以阶级、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型知识女性开始产生。这支新兴力量在20世纪初的迅速壮大,对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时期: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于辛亥革命时期。其显著标志是,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年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已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他们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并在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易言之,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主体意识已由自在自然阶段进化到自觉自为阶段。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自立自尊自信的人格意识自觉确立

自立是人的尊严的起点,只有自立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不依靠仰仗他人。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十分重视“自立”的意义。在她们看来,欲实现男女平权,首要的是从思想深处消除依赖之劣根,确立“天下事靠人是不行,总要求己为是”^{[1](130)}的信条。早在

1903年龚圆常指出:“盖期望人者,决不欲其有所依赖,而必求其独立。善自助者,决不乐他人代为筹长策。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2](191)}陈撷芬在她主办的《女学报》上接连撰文,疾呼女界应立即振作。她在《独立篇》中说,“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3](245)}。女界“梁启超”之称的张竹君在爱国女学校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对女界“依赖之根性至今犹未拔”也深感忧虑,强调“欲言救国,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次则肆力学问,厚结团体”^{[4](303)}。说法虽有不同,意思却是一个,就是强调自立对女子解放的极端重要性。

难能可贵的是,先进女性还认识到精神上的自立是以经济上的自立为前提的,反复强调“女子苟能治实业,即为自立之首基”^{[4](303)}。在她们看来,有了经济上的自立,女性才有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自己决定生活方式的可能,从而也就在心理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感。秋瑾针对当时妇女对男子普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反复告诫女界“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她说:“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这样也可以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1](15)}。基于此,一些知识女性试图通过创办女子自立团体、女子工艺厂和女子手工艺传习所等方式,来谋求女子经济上之自立。辛亥革命后,在“实业救国论”的影响下,先进女性更是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女子实业运动。这些活动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向社会首次展示出妇女的经济能力及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实业活动并未维持多久。

除却依附心理,女性的自轻自贱、甘为人下的心理也是女性走向近代化、完善人格的一大障碍。常熟女性汤雪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女子,自轻自贱,放弃天职,甘为他人残酷,故慢慢地在天演淘汰中渐渐地变成劣种人品……故我们女子数千年来昏昏沉沉,落在女狱里边,竟失却本来的性质。”^{[5](227)}女性自卑自贱意识,直接导致了妇女自我贬抑的习性,令女性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严重制约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化。有感于斯,20世纪初先进女性大声疾呼女界破除“男

贵女贱”陈腐教条,树立自尊自爱意识,正确看待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抛弃那种生为女人而“自轻自贱”、“妄自菲薄”的自惭态度。正像先进女性反复告诫的,我同胞女子“不要自己太看得轻了,我们这些女子大女子、大英雄,倒实实在在有干出大事,造出世界的资格”。在这个竞争时代里“缺了有才的男子不行,缺了有才的女子也不行”^[6]。可见,一部分先进女性已经确立了自重观。

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不仅具有很强的自立自尊意识,还充满自信。有的借用我国历史上“圣人”的话来告诫女子不可“自暴自弃”：“苟能受同等教育,则尧舜人也,吾亦人也,人奚分于男女?亦为而已。男子可为尧舜,女中固有尧舜焉,而可自暴自弃乎?”^{[7](295)}意思却是说,男女同为人,亦“皆可以为尧舜”。男子既能享政治、教育等各种权利,女子岂可“自暴自弃”,而不努力去争取?更多的先进女性则引伸“天赋人权”说之义,强调中国非但能同男子一样获得权利,而且决能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各国女子完全恢复女权。她们充满信心地说:外国女子是人,中国女子亦是人,外国女子能争得权利,中国女子同样能争得权利;即或外国女子争不到参政权,中国女子也能争得,使女权在“东亚先放异彩”。先进女性自信心的确立,显然是她们革命主动精神的生动反映和体现。

自立、自尊、自信意识的自觉确立,是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女性自强不息的动力所在。实际上,先进女性兴女学,办实业,乃至投身反清革命,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幕接一幕,一浪高一浪,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与深化。

2、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普遍确认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只有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的单方面义务,却不能享有女性作为人的普遍的权利。对此,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一改维新女性片面注重女子义务而忽视女子权利的倾向,以近代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鲜明地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观。她们论述说:天之生人,无论男女,原本无轻无重。只因后世创为“天高地卑”,扶阳抑阴,“女界同胞遂退于劣败之地,而究非天演公例也”。由此理直气壮宣布:恢复女权,不过是“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之要求”^[8]。

有的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同是为人,同受天赋人权利,而尔独放弃之。凡放弃自由者,必与侵入自由者同罪。”^{[9](251)}有人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与憧憬:“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立毋宁亡,精神所至,金石为开。起——起——起,我女界当树独立之帜,而争平等之幸福也。兴——兴——兴,我女界当撞自由之钟,而扫历史之秽史也。”^{[10](214)}有的女子刊物甚至发出了“女权不复,勿宁死”的口号。凡此种种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女性争自由、复女权的强烈愿望,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苏醒。

那么,女子应享有哪一些平等的权利呢?当时先进女性提出了五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在她们看来,男女同有天赋之权力,同有争存之能力,而缠足使女性成为“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严重侵犯女性身体健康权和发展权,因此,欲争女权,首先就应铲除缠足陋习:“近今同胞尚不能保全其肢体而摧残削弱之,遑论权利。”^{[11](867)}有基于此,先进女性组织不缠足会,创立女子刊物,通过画片、诗歌、小说、传单、唱词等形式,开展了史无前例的不缠足运动,进而出现了“天足兴,纤足灭”的可喜景象。

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她们认为,欲实现女权有赖于女子知识水平的提高,昔日男女之所以不得平等,其根源在于“学之不足”。学不足,则无以自养,无以自立,无以有自己的思想。女界开化且难,何言平等?因此,“欲倡平等,乌可不讲求女学?女学不兴,则平等永无能行之日”^{[12](300)}。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世纪初先进女性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她们有的在本宅自办女学,有的将自己妆奁变价作为女学堂的经费,有的捐出巨款兴办女学,甚至为兴女学而殉身。

三是要求婚姻自由权。中国男女结婚历来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男女当事双方“无容喙之余地”,对此先进女性普遍十分愤懑,认为这种“专制婚姻”,坏子女之品性、坏夫妇之爱情,为“神州之一大污点”。据此,她们疾呼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宣称:欲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须“自婚姻自由始也”。深信只要“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女子定可自立,女权定可恢复,“国家也就强固了”^{[13](258)}。把婚姻自由和女性解放、国家富

强结合起来,无疑是深刻的。

四是要求女子经济独立权。她们认识到,妇女经济不独立是失去人格独立的关键,是女子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妇女“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妇女一旦获得经济独立权,“不逮十年,女界中殆无不兴之学,亦无不复之权矣”^{[13](246)}。经济独立了,才能摆脱对男子的依赖性,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3](70)}。20世纪初,先进女性已沿着这一思路来寻求妇女的经济独立和解放道路,比戊戌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五是要求女子政治参与权。在她们看来,权利与义务应是统一的,没有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道理,“女子既然与男子同时有纳税的义务,就应当与男子一样有参政权利”^[14]。有的依据进化论学说,指出恢复女权,要求参与权,亦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说:“女子之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15]。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女子所掀起的参政运动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和深化。尽管这次参政运动受挫,但是,中国女子破天荒的参政实践活动,深化和拓展了近代中国女权思想,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全面苏醒。

先进女性在强调义务意识的同时也开始强化权利意识,在强调身体权、受教育权的同时亦强调女子经济自立权、政治参与权,彰显出女权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新觉醒。

3. 救亡强国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入人心

责任意识是与权利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主体意识。众所周知,受男性本位的制约,作为社会存在,女性被远远地排斥在社会大舞台之外,被禁锢在狭小封闭的家庭之中,尽“主中馈”、“务蚕桑”、“不言外”之义务。长此以来,“贤妻良母”内化为广大女性人生追求与人格完善的惟一目标。有基于传统女性惟有家庭意识而乏社会意识的缺憾,维新女性曾鲜明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口号,号召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与男性一起共担救亡之责。20世纪初年的先进女性则从权利与义务关系这一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她们认为,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要实现男女平权,就首先必须像男子

一样尽国民之义务;不能与男子尽同等之义务,就不得与男子享平等之权利。“世岂有不尽义务而能享权利者也?今日之义务轻一分,日后之权利减十分”^{[16](226)};“男女各半,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此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文明之国,男女有平等之权利,即有平等之责任”^{[17](212)}。那么,女子的义务和责任应包括哪些内容呢?觉醒了的女性针对“为男子计,为家庭计”的贤妻良母的奴化女子的教育思想提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18]也就是说,她们并不反对做贤妻良母,问题的关键是不应以此作为女子义务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国破山河碎的近代中国,她们极力要求扩大家庭责任的范围于社会,要同男子一样尽爱国的义务和责任,谋国家独立和昌盛。安如在《论女界之前途》中指出:“神州赤县,扫尽胡氛,铜像巍巍,头颅大好,非我姊妹之责而谁之责耶?若[]家庭,拘挛名义,求为一贤母良妻而自足,或恫于言论之恶潮而灰心丧志,则果乌用此学问为也?我最亲爱之二万万兄弟……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19](234)}著名“巾帼英雄”秋瑾在《勉女权歌》里唱出来了妇女“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共同心声。歌词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技,一洗从前羞垢。若安作同侪,恢复江山劳素手。”^{[1](117)}在弹词《精卫石》中,秋瑾还写道:“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号召“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进清王朝共同战斗。诸如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不尽义务,焉得权利”等等,更屡见于先进妇女的演说和文章中。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也是先进女性投身爱国运动、参加反清斗争、掀起参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辛亥时期妇女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不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充分彰显出觉醒女性群体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蓬勃的生机活力。

三、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

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于19世纪末20世

纪初,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时局的严重压迫。这是近代先进女性觉醒的重要外在动因。《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空前,特别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更是把中国逼向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境地。这种危机感、紧迫感使先进女性也深受震动,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在国破河碎的近代中国,广大女性不应“为男子计、为家庭计”,应走出家庭,与男性共担救亡之责任,诚如《留日女学会杂志题辞》所指出的:“亡国之惨,一国之男子固受其祸,一国之女子亦受其祸。故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20](833)}很明显,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直接催生了先进女性社会责任意识。

其二,女性自身素质的显著提升。这是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大力鼓吹下,清政府官方教育改革的直接刺激下,产生于戊戌变法高潮之中的近代意义的女子教育随着新式学堂的涌现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女学热也随之而兴起。1907年,据京师、直隶、奉天等的统计,全国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此外,在全国各类学校中,还有女学生141000人。受教育面的扩大,智识的普遍提高,使得女子更易于面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追求自身的解放出发,逐步发展到追求整个社会的改造。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还有百余人的留日女学生。这批以秋瑾、陈撷芬、林宗素、张竹君等为代表的热血青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后,妇女运动兴起,福泽谕吉和森有礼诸人提倡女权,主张人类皆有自由自主权力,展开了争取女权运动。怀着寻求救国救民和解放妇女愿望的青年妇女到了日本,受到明治遗风的刺激,迫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于是,回国后,办报刊,组团体,积极从事各种活动,探求妇女解放与革命救国的道路,成为继男性先进人物之后,提倡女权、推动妇女解放的新兴力量。

其三,西方女权理论的广泛传播。这是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思想武器。20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广泛传播,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及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等西方女权理论开始大量输入。这些理论,

深刻地启迪广大先进女性,大大地深化了她们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关于这一点,《女子世界》杂志曾形象地描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汨汨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则我女子世界发达之一日。”^{[21](930)}显然,西方女权理论成为先进女性进一步觉醒的催化剂。

总之,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在特定的时空交叉碰撞的产物。

四、简短的结论

审视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演进过程,至少有两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一,女性解放从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互动,但归根到底则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自觉才能自主。自我意识的确立是“自由的首要条件”^{[22](35)}。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确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纵观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历程,诚然,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确实给妇女解放提供了契机,男性思想家的倡导组织也对妇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但外因终究是变化的条件,而要在这种适宜的土壤里使妇女解放这棵嫩芽茁壮成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最终还得通过女性自身这一内因的作用不可。试想,如果没有康同薇、陈撷芬、林宗素、秋瑾等一批先进女性群体崛起与积极回应,废缠足、兴女学等思想将永远停留在观念形态上而毫无实际意义。因此,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解放也将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23](73)}。

其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的发展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既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和新制度的建立,还包括旧有观念的更新。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但必须看到,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并

没有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男性本位文化和群体守旧观念还普遍存在,因此,广大女性要在这庞大的社会阻力面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变革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议的。这决定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程度的有限性。它也昭示着人们,自觉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而是一种长期文化建设,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条件而逐步实现观念更新。

参考文献:

- [1] 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 龚圆常.男女平权说[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3] 陈撷芬.独立篇[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4] 张竹君.张君竹在爱国女学校欢迎会上的学说词[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5] 汤雪珍.女界革命[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6] 君剑.女子之责任[J].竞业旬报,1903,(6):1.
- [7] 张昭汉.神州女报发刊词[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8] 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J].妇女时报,1912,(8):1-2.
- [9] 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0] 鹃红.哀女界[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1] 柳亚子.黎里不缠足会缘由[A].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C].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 [12] 张肩任.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3] 江毓真.论婚姻自由的关系[A].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崇.女子应有参政权[J].女学生,1904,(3):2-3.
- [15] 杨季威.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J].妇女时报,1912,(6):2-3.
- [16] 陈撷芬.中国女子之前途[A].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7] 论文明先进女子[A].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8] 吕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J].女子世界,1904,(9):3-4.
- [19] 安如.论女界之前途[A].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20] 柳隅.留日女学生杂志题辞[J].张謇,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C].上海:三联书店,1963.
- [21]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A].张謇,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C].上海:三联书店,1963.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From Dependence to Independence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awakening of the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CHEN Wen-li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awareness of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is the result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nd religious society to a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The "Wu Xu" political reform period wa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awareness of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which didn't reach its mature stage until "Xing Hai" revolutionary period. Self-support and self-esteem are the notable sig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s awareness of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awarenes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saving and strengthening China were established in a passel of female pionee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s awareness of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not only profoundly affected Chinese women's liberal history but also enlighten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women; principal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women liberation

[编辑:颜关明]